

高等学校编辑专业教学参考书

20 世纪 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辑

6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张仲实

我的编译生涯	张仲实(2)
为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张仲实(6)
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是十分重要十分光荣的工作 ——在祝贺张仲实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研究和 出版工作 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王 震(8)
张仲实 50 年编译工作纪实	姜椿芳(11)
仲实同志在生活书店的日子	邵公文(14)
六十春秋风和雨 ——怀念张仲实同志	帅孟奇 杨献珍 王炳南 高克林 莫文骅 沈兹九(16)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	吴殿尧(21)
略论张仲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书刊出版史上 的历史性的贡献	林理明(37)
西秦升起的红星 ——记著名马列著作翻译家张仲实	祁念曾(44)
存目	(60)

丁 玲

- 我的自传 丁 玲(62)
- 《北斗》创刊号编后记 丁 玲(64)
- 《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〇一期编者的话 丁 玲(66)
- 《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 丁 玲(69)
- 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 丁 玲(74)
- 毛主席和丁玲的二三事
- 悼念丁玲同志 甘 露(83)
- 忆三十年代的丁玲同志 郑育之(89)
- 陈企霞谈丁玲——真诚坦白的心灵 胡国华整理(96)
- 一个无私无畏的人 胡 真(102)
- 丁玲的文艺副刊编辑思想初探 胡畅萍(109)
- 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
- 陈明访谈录 闻 亮(113)
- 《红黑》、《人间》与丁玲的早期编辑生涯研究 石潇纯(121)
- 丁玲,党报文艺副刊的奠基人
- 纪念丁玲同志诞辰 100 周年 黎 辛(129)
- 丁玲说《北斗》 颜 雄(147)
- 丁玲编辑工作年谱 萧 杨(174)
- 丁玲为办《中国》惊动两位中央领导
- 我看丁玲办《中国》之一 王增如(178)
- 绽放在春天的《中国》
- 兼议丁玲晚年的编辑思想 王建湘 石潇纯(195)
- 存目 (205)

徐伯昕

国统区革命出版工作

——1949年10月6日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	
作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报告	徐伯昕(210)
怀念父亲徐伯昕	徐 敏(230)
追念伯昕同志	沈粹缜(235)
一代多才多艺杰出的出版家	
——深切悼念徐伯昕同志	李 文(240)
徐伯昕同志与生活书店	邵公文(243)
生活书店门市工作的特色	
——为纪念徐伯昕同志而作	王仿子(256)
徐伯昕在香港生活书店的日子	王仿子(266)
存目	(278)

臧克家

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说明

——《中国新诗选 1919—1949》后记	臧克家(281)
长夜漫漫终有明	臧克家(283)
《避暑录话》与《星河》	臧克家(302)
一个理想的实验	
——四个半月副刊编辑的回味	臧克家(308)
我与《诗刊》	臧克家(309)
沧海横流安足虑	
——《毛泽东诗词鉴赏》前言	臧克家(315)
在《诗刊》编委座谈会上的发言	臧克家(318)
在编辑岗位上的臧克家	孙继国(321)
试论臧克家文艺报刊的编辑实践与思想	胡正强(328)
悼臧老	樊希安(338)
送别臧老话诗缘	王国钦(341)
臧克家与《诗刊》	贾金利(343)

存目	(352)
----------	-------

楼适夷

零零碎碎的记忆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楼适夷(355)
我谈我自己	楼适夷(373)
文坛宿将老编辑,学海硕子名作家	
——记国家出版委员会委员楼适夷	岳洪治(415)
笔底烽烟著春秋	
——记楼适夷的编辑生涯	刘为民(418)
悼念楼适夷先生	舒 芜(428)
怀念楼适夷先生	
——我与楼老的交往和联系	谢德铤(434)
黄源与楼适夷	黄明明(437)
生无所息	
——怀念适夷同志	周而复(443)
追思适夷	许觉民(456)
存目	(462)

张明养

从我与开明的关系谈到开明精神	张明养(465)
《世界知识》创刊初期的战斗历程	
——祝《世界知识》创刊 55 周年	张明养(469)
我和《中学生》	张明养(479)
怀念和感激	
——纪念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五周年	张明养(482)
集专家教授编辑于一身	
——张明养的编辑生涯述略	戴文葆(484)

悼张明养同志	郑森禹(503)
沉痛悼念张明养同志	雷洁琼(507)
贡献犹多热与光	
——我的老师张明养教授	戴文葆(511)
存目	(516)

张仲实

张仲实(1903~1987),陕西省陇县人。原名张安人,笔名安人、任远、实甫。著名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出版家。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革命。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不久,党组织派他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8年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张闻天领导的翻译馆从事马列主义教材的翻译工作。1930年回国后,在唐山、上海从事



进步文化活动。随后,参加了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的编辑工作。1935年起,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先后主编和参与了《世界知识》、《国民公论》、《抗战》三日刊等刊物的编辑工作。此间,他翻译出版了几部马列主义的重要著作。1940年到延安,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党的教育科长、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组组长等职。全国解放前夕,协助中央拟定了一套含12种书的“干部必读”学习计划,并负责编辑出版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发展

简史》等著作。

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国际宣传处处长,兼中苏友协总会副总干事和宣传部主任。1953年6月调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调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翻译局副局长,参与了中央决定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三部重大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为在中国宣传普及马列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的编译生涯

张仲实

1903年夏天,我出生在陕西省陇县北郊店子村一个中农人家。年青时在陕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参加了共青团。

1926年7月,我从陕西来到上海投考大学,得知中央要送一批人去苏联学习。我因在陕西时已和上海党中央有联系,所以就给中央写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要求。考试合格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上海出发,经海参崴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合并后,我也转到中大,被编在翻译班,翻译教材,成了工作人员。到1930年才回国。在这4年里,我学习了俄文,开始接触了翻译工作。

第一次从事翻译工作,大约是在1931年。当时我在上海,失掉了党的关系,又没有固定职业。花了半年时间译出了拉皮杜斯、奥斯特洛维恰涅夫的《政治经济学》,可惜找不到关系,没有人肯出版。译稿没有印制成书,想弄点稿费来维持生活的打算也随之落空。尽管如此,翻译这30万字的《政治经济学》对日后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还是很有好处的。

正当我苦于无生活来源之际,偶然从《申报》上看到了神州国光社招考校对生的广告,遂去报考,记得是刘执知考的我,结果被录取到神州国光社当校对。1932年我辞退神州国光社工作,去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在那里主要是给《时事类辑》杂志从苏联报刊上翻译国际问题的文章。干了一年左右,在该馆迁往南京前,我又退出文化教育馆,留在了上海。

1935年2月,经胡愈之介绍,我进入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是30和4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一家进步书店。它是个合作社组织,所有该店的工作人员都是它的社员。股金从每月工资中扣除。起初它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社的书报代办部,1932年改为生活书店。到1935年就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五十多处,工作人员数百人的有影响的书店。生活书店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由全体工作人员选举产生。

在30年代,生活书店是韬奋据以进行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的坚固堡垒。他所办的《生活》周刊被封了,又出《新生》;《新生》被查封了,又出《大众生活》,《大众生活》被禁了,又出《永生》(《新生》、《永生》两刊,虽不是韬奋主编,但实际上则是一脉相承);《永生》被查禁了,又办《生活日报》,这个日报自行停刊后,又出《生活星期刊》;《生活星期刊》停了,“八一三”沪战开始,又出了《抗战》三日刊,进而发展为《全民抗战》;在《全民抗战》被禁,迁到香港后,又恢复了《大众生活》。这样再接再厉、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方面说明了韬奋如何坚守岗位,令人尊敬,同时也说明了生活书店是一个如何重要的文化堡垒。

当时生活书店还是一个进步的出版、发行中心。在这个时期,生活书店除出版《生活》周刊和其后继的一脉相承的姊妹刊物外,还出版有《世界知识》、《文学》、《妇女生活》、《太白》、《生活教育》、《译文》等。这些杂志都是进步的,风行一时,大受读者欢迎。

我进生活书店后,主持编辑原来由胡愈之主编的《世界知识》

杂志,直到1936年1月我被选为生活书店理事会理事。《世界知识》杂志无论在介绍国际时事和论述国际问题方面,还是在宣传抗日救亡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周恩来曾为这个刊物亲笔题写刊头“世界知识”四个字。陈毅在它创刊30周年时,亲自写了纪念文章,说《世界知识》在解放以前“是有进步作用的”,在解放以后“也是有成绩的”。

1935年底到1936年初,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我和金仲华、柳湜等都是《大众生活》编辑组成员),热烈地支持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热烈地拥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个刊物的销售额因而增加到二十多万份,创造了我国历史上报刊销数最高的记录。于是国民党就对邹韬奋大加迫害,邹被迫逃亡香港,他临走时对生活书店作了一番安排,让我担任该店总编辑。

我主持生活书店的编辑工作以后,为了宣传抗日救亡,为了宣传革命理论,曾把该店出版范围扩大,有计划地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黑白丛书”、“救亡丛书”、“世界文库”和“世界名著译丛”等等。凡生活书店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均属“世界名著译丛”(或“世界学术名著译丛”)之列。

此外,我在这些年里,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政治书籍。我给自己作了每天至少翻译两个小时的规定。当时年轻,精力旺盛,书店下班后就抓紧时间搞翻译。这样坚持不懈译出的书籍有: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哲学”条目、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等。这本《政治经济学讲话》通俗易懂,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它不仅在提高青年社会科学知识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好多青年因读了此书而参加了革命。

这样,从1926年学习俄文开始,到生活书店的实践,使我最终决定了今后要走的道路:毕生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

后因生活书店要在新疆建立编辑中心,我又于1938年底和茅盾一家来到迪化(今为乌鲁木齐),那里盛世才统治严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纷纷遭到逮捕迫害,遂于1940年和茅盾一起经西安到延安。

我来到革命圣地后开始在马列学院搞翻译工作,主要是根据俄文校订《列宁选集》的译稿,因为有些译稿是从英文译出的。

1941年7月,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该院设八个研究室:哲学、马列主义、国际问题、经济学、文学、党史等。我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

1941年9月,中央设立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该研究室下设政治、经济、国际问题三个研究组,我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

1942年一天,在毛泽东办公室参加了他召集的《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一书编辑会议,到会者有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等。会议决定:大家分头找材料,由一个人整理编辑,最后送毛泽东审阅。后来毛泽东看了这份整理的初稿,认为不适用。他自己重新编辑最后成书。这就是后来流行的《思想方法论》。

1943年6月~1946年11月,我被调往中宣部工作,担任出版科副科长(科长是许之桢),主管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即延安解放社的编辑出版工作。

1947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住定后,就开始筹备全国土地会议。委派我到晋察冀中央局去找材料,结果,我编印了一本《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

1949年2月间,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央叫我提出一个学习理论的计划,我就同胡乔木同志商量,拟定了一个学习书目,经中央批准,这就是“干部必读”12种书。其中《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发展简史》等系我编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亲自编辑,我和艾思奇

同志、吴亮平同志、柯柏年同志等参加了搜集材料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先在中宣部后在西北局宣传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校订工作。

现在,我已进入古稀之年,但是,看到我国翻译马列主义著作的同志愈来愈多,研究马列主义的队伍越来越大,我仍然感到振奋,受到鼓舞。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原载《出版史料》1983年第2辑

为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张仲实

当我得知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研究会、翻译工作者协会、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同志们准备召开祝贺会后,心情一直很不平静。面对这样高的荣誉,思前想后,深感不安。特别是在会上听了王震同志讲话,姜椿芳同志代表四个单位的祝词,和其他同志的发言,我感到对我的表彰愧不敢当。同时深深地感到,这是党中央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我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已近百年,不少先烈、前辈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牺牲了生命。会上在座的就有好几位先我投身这一工作的前辈、老朋友。他们的卓越成就,更值得称颂。如果说50年来,我的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那也是同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我仅仅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做的一点工作。

50多年前,我不过是西北农村的一个穷学生。党组织把我送到苏联学习,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掌握了一定的翻译能力,为我走上翻译马列著作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回顾这 50 年的道路,我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30 年代在白色恐怖、高压禁锢下的上海,马列著作的翻译、评介文章,既缺乏参考书籍,又不能公开讨论,基本处于一种地下工作状态。要出版这些著作,更是困难重重,处处危险。不少名著往往只能改头换面,节译发表,有些迫于形势未能发行就夭折了。

40 年代,我经新疆去延安,虽然那时候边区条件差,不可能全面系统地翻译出版经典著作,但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研究,已成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当时全党上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工作的开展。

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在主席、总理、少奇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创建了编译局,选派组织了一只专业化队伍,展开了大规模系统翻译工作。1954 年,我调到编译局后,即参加了这个集体的译校工作。在出版界同志们有力配合下,30 年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之全面展开的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日益深化。50 年的切身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党对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研究极为重视。毛主席早在延安就曾对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做出了高度评价。从延安到解放后,我有幸几次聆听主席关于做好翻译、出版工作和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谈话。特别是主席一再指出对马列主义研究要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与不少同志,特别是先我投身这一工作的老同志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成长和走过的。我十分赞同有些老同志所讲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小平、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掌舵,我们党进入了历史中最好时期之一,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个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以及令人鼓舞的新成就的出现,翻译、出版和对马列主义著作的研究,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取得了可喜

的成果。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在今天看到我们党、我们的祖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成功之路,怎能不为之欢欣鼓舞?我虽然年高体弱,退居二线,但我决心坚定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同志们学习,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继续发挥余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原载《出版工作》1984年第5期

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是 十分重要十分光荣的工作

——在祝贺张仲实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研究
和出版工作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王 震

同志们,今天,中央编译局、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这里联合举行庆祝会,庆祝张仲实同志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50周年。我应邀参加这个盛会,感到十分高兴。我向张仲实同志表示热烈祝贺。

张仲实同志是我国理论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一位深受大家尊敬的老同志。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为革命事业工作。革命战争年代,无论在环境十分险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白区,还是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解放区,张仲实同志都在孜孜不倦地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真理。我在仲实同志到达延安后才同他认识。当时仲实同志就在从事马列著作的编译、研究和出版工作。后来他一直在这条战线上坚持战



王震(右一)在祝贺张仲实(左一)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出版工作 50 周年大会上讲话

斗。仲实同志为传播马列主义奋斗了一辈子。他的这种革命精神是很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十分光荣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事业的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我们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经过 28 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些胜利的取得是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的。而传播马列主义是同许多从事马列主义

著作编译出版工作的同志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张仲实同志严谨治学、业精于勤的奋勉精神值得大家尊重、尊敬和学习。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偏僻的山沟里,我们的许多同志不管条件如何艰苦,都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就有张仲实同志翻译的。有些同志还直接听过张仲实同志讲的课。张仲实同志传播马列主义的贡献,是可贵的,值得庆贺的。

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出版事业是我们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这项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出版工作的同志,为数不多,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支队伍。过去只有一部分马恩列斯的著作译成了中文,现在《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都已经出版了。但是已有的成就还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我们党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目标,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不但一刻也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且要大力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因此,我衷心希望从事马列著作编译、出版和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学习和发扬老一辈同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做好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和研究工作,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根据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对马列著作编译出版研究富有经验的老同志、老前辈关心和帮助中青年干部的成长,培养更多才德兼备的接班人,为繁荣马列著作编译出版事业,为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促进编译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书籍,推进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祝张仲实同志健康长寿。

原载《出版工作》1984年第5期

张仲实 50 年编译工作纪实

姜椿芳

张仲实同志 1903 年生于陕西省陇县。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 60 年。早在 1924 年,仲实同志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学生运动。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仲实同志受党的派遣去苏联学习,先后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他除了掌握俄文这一重要工具外,还学习了哲学、经济,具备了革命理论基础。1930 年回国后,他主要在白区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在上海等地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编辑出版各种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日军侵占上海后,仲实同志随同邹韬奋先生到香港,又辗转到了武汉、重庆。1938 年底,仲实同志在新疆同茅盾同志一起领导“新疆文化协会”,并在新疆学院教授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1940 年仲实同志到了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仲实同志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党组副书记,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从 1954 年起,仲实同志一直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现在是编译局的顾问。他曾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去年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仲实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主要从事革命书刊的编辑出版和马列著作的翻译研究工作,对普及革命思想和传播马列主义理论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是我国出版界、翻译界和理论界深受尊敬的老前辈。